

马克思“世界”概念的历史生成及其时间向度

冯威然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陕西 西安

收稿日期: 2026年8月15日; 录用日期: 2026年9月7日; 发布日期: 2026年9月16日

摘要

马克思的“世界”并非先在的地理空间, 而是由感性实践与普遍交往历史地生成的关系总体, “世界历史”构成其时间向度。针对既有研究将“世界”静态化、“世界历史”单向化的局限, 本文以历史生成的进路重释二者关系: “世界”范畴由形而上学实体转向社会关系总体, 经过分工深化、交往媒介变革与需要体系普遍化三重机制, 由潜在总体转为现实总体; 资本以“用时间消灭空间”的方式中介这一生成, 时空互构同时展开为时空对抗, 凝结为依附与发展赤字、代谢断裂与生态危机、物化与智力剥夺三重结构性危机; 其扬弃有赖于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性联合、多元开放的历史路径与作为调节性理念的“自由王国”。实现“世界”与“世界历史”的统一, 是每一代人需重新思考并付诸实践的开放性任务。

关键词

马克思, 世界, 世界历史, 时间向度, 历史生成

The Historical Genesis and Temporal Dimension of Marx's Concept of the “World”

Weiran Feng

Institute of Foreign Marxism, School of Marxism,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Received: August 15, 2026; accepted: September 7,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16, 2026

Abstract

For Marx, the “world” is not a pre-given geographical space but a totality of social relations historically generated through sensuous practice and universal intercourse, with “world history” constituting its temporal dimension. Addressing existing studies' static treatment of the “world” and unilinear reading of “world history,” this article reinterprets their relationship through a genetic approach: the category of the “world” turned from a metaphysical substance into a totality of social relations and, driven by the deepening division of lab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means of intercourse,

文章引用: 冯威然. 马克思“世界”概念的历史生成及其时间向度[J]. 哲学进展, 2026, 15(9): 234-241.

DOI: 10.12677/acpp.2026.159443

and the universalization of the system of needs, developed from a potential into an actual totality. Capital mediates this genesis by “annihilating space with time,” whereby spatio-temporal interconstruction unfolds as spatio-temporal antagonism, crystallizing into three structural crises: dependency and the development deficit, metabolic rift and ecological crisis, and reification and intellectual expropriation. The sublation of this alienated world depends upon the world-historical association of the proletariat, plural and open historical paths, and the “realm of freedom” as a regulative idea. The unity of the “world” and “world history” thus remains an open-ended task that every generation must rethink and put into practice.

Keywords

Marx, World, World History, Temporal Dimension, Historical Genesi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 pp. 540-541)这一论断表明，“世界”与“世界历史”并非平行发展的两个范畴，而是同一历史过程的两个维度。

围绕二者的内涵及其关系，学界已积累了丰富成果，其中两种国外代表性解读路径尤需先行检视。以列斐伏尔、哈维为代表的时空批判路径以“空间的生产”“时空压缩”打破了传统“重时间、轻空间”的成见，但空间由此被抬升为准本体论的解释原则，“用时间消灭空间”被降格为流通领域的经验现象，“世界”的生成性质与“世界历史”的主体维度反遭双重遮蔽[2][3]。以沃勒斯坦、阿明为代表的世界体系与依附理论路径有力呈现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不平等本质，但其中隐含的结构主义倾向则将“世界体系”视为给定的再生产框架，资本主义世界边缘地区的依附地位被预定为宿命，它们至多被设想为有待外部力量拯救的被动客体[4][5]。国内学者则侧重回到马克思的文本与方法揭示上述得失：有学者以世界体系的发展变化为主线考察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结构的演进[6]，还有学者阐发了世界历史理论的“未来时间视野”[7]，也有学者梳理了把握“世界哲学”的多重图景[8]。这些成果为准确理解唯物史观的世界和世界历史提供了重要借鉴，但就本文论题而言仍有三点不足：其一，它们多将“世界”默认为静态的客观地理空间，遮蔽其作为社会关系总体的生成性质；其二，它们多将“世界历史”单向度理解为时间中的阶段更替，未能阐明其作为“世界”现实化过程的理论实质；其三，空间结构的撕裂与时间进程的异化往往分而论之，未能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的统一视域中加以把握。

有鉴于此，本文尝试通过历史生成的进路重释二者的关系：不把“世界”当作现成的给定之物，而追问它如何由感性实践与普遍交往所生成、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下如何异化又如何在危机中孕育再生的可能。

2. 范畴生成：“世界”与“世界历史”的理论实质

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中，“世界”与“世界历史”是统一于现实的人的感性实践活动之中的同一历史过程的两个维度。马克思对“世界”概念的考察，关键在于揭示了“世界”由旧形而上学的静态先验实体

向生成性的“社会关系总体”的转向；而这一转向之所以能够确立，又在于马克思洞察到：世界各地原本孤立分散的地方历史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普遍交往中最终生成为“世界历史”，从而为“世界”注入了现实的、历史的时间向度。

2.1. “世界”范畴由形而上学向关系总体的转向

在近代西方哲学史上，无论经验唯物主义的直观集合、唯理论的先验整体，还是康德的理性理念与黑格尔的思辨舞台，“世界”始终被理解为脱离人的感性实践、在思维中被静观的先验客体或静态容器，长期陷于直观化与思辨化的困境[9]。

面对这一困境，马克思在立足世俗现实的阶段性考察中逐次深化对“世界”本质的认识。《博士论文》以“世界的哲学化同时就是哲学的世界化”的命题，表达了哲学介入并改造世俗世界的逻辑可能；《论犹太人问题》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确立了“人的世界(社会关系总体)”与“自然界”的双重维度，并借异化劳动揭示出“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1]: p. 156)的现实悖论。马克思对世界认知方式在方法论层面的突破完成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批判旧唯物主义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而不懂得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1]: p. 499)，并断言“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 p. 501)。至此，“世界”彻底告别旧形而上学的静止实体假象，被还原为以对象性活动为根基、由物质生产与社会交往动态生成的关系总体。然而，这一总体若要彻底摆脱形而上学残余，便不能停留于静态的关系规定：这一要求还需要“世界历史”的现实生成来进一步确证。

2.2. “世界历史”作为“世界”时间向度的生成

历史学的“世界历史”概念是指人类有史以来的全部历史，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概念则指绝对精神自我实现的过程；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则以唯物史观为基础，认为它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生产力、分工和交往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10]。因此，“世界”由形而上学客体向关系总体的转变，与“世界历史”的现实生成是同一理论事件的两个侧面：在前现代，“世界”仅以彼此隔绝的地方性关系网络的形式潜在存在；只有当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各民族纳入普遍联系之中，“世界”才由潜在总体转变为现实总体，“世界历史”正是这一现实化过程本身。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1]: p. 541)。这一转变由三项联系紧密的机制推动。其一是分工的深化：自然分工让位于社会分工，“分工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1]: pp. 520-521)，分工不断制造交换的必要性，使关系网络的节点持续增殖直至突破民族边界。其二是交往方式的变革：大工业使交通工具与通信手段得到根本改良，相互作用的时空成本被持续压缩，隔绝的地域在生产、交换与信息诸层面被打通。其三是需要体系的普遍化：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1]: p. 566)，需要的满足本身成为世界性行为。三机制的叠加使各民族孤立封闭的状态难以为继，地方性的局部史逐步融汇为“世界历史”。

“世界历史”的生成，使“世界”范畴获得双重规定。一方面，孤立历史的消解赋予“世界”以现实的生成性：狭隘地域内的社会关系冲破地理屏障、扩展为普遍联系网络，“世界”绝非等待填充的先验地理容器，而是在时间推演中被不断创造与重构的关系总体。这与马克思的方法自觉正相呼应：具体总体作为“许多规定的综合”和“多样性的统一”，在思维中“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11]: p. 25)——“世界”之为总体，正是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意义上被把握为生成的结果，而非先在的

实在。另一方面,“世界历史”确立了“世界”的现实性:“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1]: p. 538)是可观察的事实,每一个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对此加以证明([1]: p. 541)。总之,“世界”以感性实践为根基,由现实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动态生成;“世界历史”则构成其不断生成的动态时间向度,二者共同根植于社会生产实践。

2.3. “世界”历史形态的类型学梳理

“世界”作为生成性的关系总体,并无固定所指,其具体规定随社会形态的变迁而变迁。马克思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提供了形态分期的文本依据:“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11]: p. 52)关系以何种方式为中介,“世界”便呈现何种形态。据此,可将“世界”的历史形态概括为前现代的“地方世界”、现代的“颠倒世界”与未来的“自由王国”。

前现代的“地方世界”以人的依赖关系为总体规定。在部落所有制、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与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下([1]: pp. 521-522),社会关系由血缘、身份与地缘锚定,交往止步于共同体边界,三重生成机制均处于受抑制状态——严格说来,这一阶段存在的只是诸“地方世界”,而非作为现实总体的“世界”。资本主义的“颠倒世界”以物的依赖性为总体规定。资本增殖逻辑将一切社会关系中介于交换价值:分工深化为国际分工,交往媒介在“用时间消灭空间”的驱动下加速变革,需要体系彻底世界化。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12]: p. 35),“地方世界”由此被强行炸开,“世界”第一次成为现实总体。然而这一总体同时是颠倒的:关系的普遍化以物化方式实现,历史的加速以危机为节拍,主体的生成以无产阶级的物化为代价。未来的“自由王国”则以自由个性为总体规定。随着生产资料转归社会共同占有,关系中介由交换价值复归为联合起来的个人的直接协作,时间尺度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让位于自由时间——“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而“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13]: p. 929)。在此形态中,“世界”才成为每个人自由个性的联合空间,“世界历史”才成为自觉的人类自我解放运动进程。

3. 动力机制:资本中介下“世界”与“世界历史”的互构与矛盾

上节末已经指出,使“世界”由“地方世界”突变为“颠倒世界”、又令这一现实总体深陷撕裂的现实动力是资本;本部分的任务是将这一论断展开为具体的机制分析。在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交汇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构成了连接“世界”(空间关系网络)与“世界历史”(时间演进过程)的现实中介。

“但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13]: p. 922);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它必须永不停歇地运动、扩张与积累。“世界”与“世界历史”在此过程中既相互构建,又蕴含着深刻的对抗性矛盾。

3.1. “用时间消灭空间”的时空互构

资本对“世界”的重塑源于其扩张强制。剩余价值的生产以流通为前提,增殖了的价值必须在流通中实现自身,为此“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12]: p. 35)。前现代地方世界中长期受抑制的三重机制由此被资本吸纳并推向极端。而这一扩张之所以采取“用时间消灭空间”的特殊方式,植根于资本的价值增殖逻辑:流通时间对资本而言是增殖的空转时段,地理距离与运输时间由此成为增殖的现实阻碍。马克思揭示了这一双重运动:“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也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11]: p. 169)为此,资本持续推动交通、运

输与通信技术的变革，一切缩短流通时间的发明都被纳入这一逻辑。

由此，二者展开为相互构成的两个向度。其一是时间对空间的重组：周转周期的缩短使原料产地、生产场所与消费市场被连接为统一的生产－交换环节，空间由此演变为随周转节奏不断重组的动态网络，“世界”的关系性规定在此获得了资本主义的现实化。其二是空间对时间的深化：世界各地的局部事件不再孤立存在，而是经由普遍联系传导至总体。这种互构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运动所决定。然而恰恰是在二者的互构过程中，资本的形式规定使世界与世界历史的关系逐步转化为时空对抗。

3.2. 资本形式规定下的时空对抗

互构之所以内含对抗，根源在于资本的形式规定(Formbestimmtheit)：作为始终要求实现自身自行增殖的价值，资本的社会形式本身就蕴含着三重强制——增殖的强制，即不断扩大剩余价值的生产；扩张的强制，即不断开拓新市场、新需要与新的生产部门；度量的强制，即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统一衡量一切生产活动。由此，资本支配下的生产社会化与交往普遍化向来不是中性的技术过程。马克思对此有明确表述：“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这就是说：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13]: p. 278)资本在把普遍交往与社会生产力当作增殖手段加以使用的同时，也就把这两个蕴含解放潜能的过程，置于了与自身目的相对立的形式之下。

这一矛盾首先在空间维度上展开为“世界”内部的结构性撕裂。世界市场的铺展并未建立平等协作的关系总体，而是将剥削与积累规律强行嵌入“世界”的生成过程：资产阶级“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2]: p. 36)。这一矛盾继而在时间维度上展开为“世界历史”进程的周期性断裂。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切断了社会生产与交往的连续性，使“世界”的时间生成呈现为繁荣与崩溃的震荡交替。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本应转化为全社会自由支配时间的生产率增进，在资本形式下反而表现为对活劳动时间的过度榨取：“用时间消灭空间”为资本赢得的每一分时间，都以劳动者劳动强度的提高与工作日的延长为代价。时空双维对抗的叠加，使现实社会演化为劳动与资本对立的“颠倒世界”：死劳动统治活劳动，过去的劳动支配现在的劳动，产品统治生产者，手段吞噬目的。“世界”的生成与其时间向度的演进由此构成一对无法在资本形式之内调和的矛盾，唯有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方能使其摆脱对抗形态。

4. 危机表征：“颠倒世界”中“世界”与“世界历史”的对抗性展现

从资本主义时空重塑的动力机制可以看出，资本以剩余价值增殖为根本目的，推动着生产力的全球扩张与世界市场的确立。然而互构从来不是社会关系的和谐化：资本的形式规定使互构自始即以对抗的形式实现——对抗随着互构过程中的矛盾积累而日益显化。对照前文类型学，资本主义“颠倒世界”中“世界”与“世界历史”的对抗性危机依次呈现于关系总体、时间进程与主体形态三个层面。

4.1. 依附关系与发展赤字：空间分化

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对生产资料、金融资本、核心技术乃至底层数字基础设施的垄断，将发展中国家接入“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不平等国际分工体系；技术与财富红利向中心集中，风险、债务与贫困向边缘积聚，南北发展鸿沟的持续扩大固化了全球社会关系的对抗形态。依附虽然是“世界”之现实化在特定形式规定下的历史实现样态，而非其逻辑规定的必然内涵。既然依附是历史地生成的，它便同样是历史中可被改变的对象，尽管这种改变绝非自动到来。

4.2. 代谢断裂与生态危机：自然界限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异化不仅存在于生产关系内部，更作用于人与自然的感性联系。唯物史观

将自然界确立为人类生存和历史展开的客观基础：“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1]: p. 161)然而在资本无限增殖逻辑的支配下，自然界被降格为无偿占有的“生产要素”与“有用物”，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由此发生根本扭曲。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以致“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14]: pp. 579-580)，并在大工业与大农业的分离中造成“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13]: p. 919)。这一“物质变换断裂”命题在当代由福斯特系统重构为“代谢断裂”理论[15]。发达国家将高耗能、高污染产业与生态代价转嫁至发展中国家，全球生态不平等的空间分布，恰是“颠倒世界”结构的镜像。

全球生态危机的蔓延，使“世界历史”遭遇严峻的自然生态界限。本文的“世界”同时涵纳“人的世界”与作为人之“无机身体”的自然界，生态危机正是这双重维度断裂的总爆发。技术本身服务于增殖逻辑，效率的每一分增进都被重新吸纳为扩张的动力，自然界的生态承载力反被加速逼近其承载阈值——时间向度的“节奏”维度在此遭遇不可压缩的外部界限。恩格斯的警示至今有效：“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16]: p. 559)以无限增殖为目的的生产逻辑与有限的地球生态承载力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世界历史”的推进无法无限制地建立在对自然基础的掠夺之上。

4.3. “人的世界”的物化与智力剥夺：主体消解

资本主义对“世界”与“世界历史”的撕裂，终究落实于对现实个人的剥削与主体地位的消解。社会分工的私有制性质使生产资料同劳动者彻底分离，全社会世代积累的“一般智力”——即“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的“一般社会知识”([11]: p. 198)——被资本私有化占有：机器“是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识力量”([11]: pp. 195-196)，然而这一人类集体智慧的结晶不归生产者支配，反而作为固定资本与生产者相对立，并进一步物化为自动机器体系与算法结构。此处所谓“智力剥夺”，正是对这一现象的概括：一般智力为资本占有并物化之后，生产者对生产过程的理智控制被系统性剥夺。与智力剥夺同步的是社会关系的物化：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14]: p. 89)，“人的世界”退化为死劳动统治活劳动、资本统治主体的异化场域。

智力结晶的资本化同时导致现实主体遭遇深度的劳动异化与主体性消解。布雷弗曼的研究表明，科学管理非但未使劳动恢复理智内容，反而系统剥夺了劳动者对生产全过程的控制[17]。在算法实时调度劳动过程的今天，这一逻辑以数字化形式被推向极致。处于价值链末端的劳动者被降格为机器体系与算法程序的附庸，本应成为自由时间之占有者的无产阶级，恰恰丧失了对时间与历史的支配权。

5. 实践重构：“世界”的异化超越与“世界历史”的自觉演进

前文末已指出，三重结构性危机互为条件、层层递进，资本形式之内不存在“颠倒世界”的自我修复机制；但普遍交往与世界市场在制造对抗的同时，也为扬弃对抗准备了客观物质条件与历史主体基础唯物史观的理论落脚点向来不在于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而在于从危机的解剖中提炼超越的现实实践路径。

5.1. 主体之维：变革主体的历史生成

在现代生产力迅速发展与世界市场空前扩展的背景下，也将各国劳动者普遍纳入全球价值链与分工体系，使其结构性处境趋于同质化。这一同质化沿三重维度展开：在生产层面，国际分工将不同国别的劳动过程纳入同一价值增值链条，各国劳动者遂面对同构性的支配结构，尽管其被支配的具体形式与程

度存在显著的国别差。在生活层面，世界市场使消费需要、劳动再生产条件乃至失业与危机的冲击在全球范围内传导，局部劳动群体的命运愈益取决于远离其经验范围的世界市场波动。在组织层面，交通与通信技术的持续变革在便于资本全球调度的同时，也客观上降低了跨国信息传递与人员联络的成本。按照唯物史观的分析逻辑，上述进程在客观上为既有生产关系的变革准备了潜在的主体性条件——这一条件的“潜在”性质意味着，它只是变革的可能性空间，而非变革本身。就其结构规定而言，这一变革主体自身处境的改变与整个社会的结构性变革互为条件：离开后者的彻底变革，前者的解放便无从谈起；反之，前者也构成后者得以现实化的承担者。据此，这一变革主体在理论上获得了“世界历史性存在”的规定。当然，这一规定的现实化程度，仍须结合具体历史条件加以考察。

5.2. 路径之维：晚年人类学与多元道路

马克思晚年在《人类学笔记》与《历史学笔记》中，通过对摩尔根、柯瓦列夫斯基等著作的研究，澄清了历史演进道路的多样性逻辑，自觉抵制了单线进化论的读法：针对有人试图把《资本论》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扩展为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马克思明确回绝——“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18]: p. 466）。唯物史观揭示的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物质机制，而非各民族历史进程的统一时刻表，前文所批判的西方中心主义叙事恰恰是马克思本人所拒绝的读法。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及其草稿中，马克思提出了俄国农村公社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在世界历史普遍联系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已经存在的条件下，村社“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18]: p. 587）。因此，“世界历史”的普遍联系不意味着同质化抹平不同地方世界的差异，而是意味着各民族可以通过不同道路的实践汇入人类解放进程。

5.3. 形态之维：双重和解与自由王国

自由王国的实现有赖于实现“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1]: p. 186）；它并非抽象道德预设，而是植根于唯物史观所揭示的发展趋势。在自由王国中，“世界”与“世界历史”摆脱资本形式规定的异化扭曲，向“自由王国”跃迁。就人与人的关系而言，随着生产资料转归全社会共同所有，私有制与强制性分工被消灭，拜物教的假象随之消解，社会关系直接表现为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自由协作——“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2]: p. 53）。与社会关系的去物化相适应，“世界历史”的时间进程实现财富尺度的彻底转换：在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条件下，“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11]: p. 200）。自由时间的占有与自由王国的建立，才意味着“世界”真正成为自由人的联合空间，“世界历史”成为人类能力作为目的本身而发展的自觉历史。但自由王国的实现并不意味着历史矛盾的终极消解，而是矛盾形态的历史性转变，对“自由王国”的把握不应采取“预定终点”的方式。

5.4. 限度之维：现实障碍与实践进路

唯物史观的科学品格必然要求在阐明实现“世界”与“世界历史”统一为何可能的同时说明“何以困难”。其一，无产阶级普遍联合在当代面临必须正视的现实障碍。第一，全球价值链的等级分工分化了各国劳工的利益结构，中心国家劳工在相当程度上分享着外围剩余价值的转移，形成列宁所批判的“工人贵族”现象，“全世界无产者”在经验层面远非利益同质的主体[19]。第二，资本流动性与劳工地域性之间存在不对称：资本可近乎瞬时地跨境转移，劳动者则受制于移民管制与文化纽带而高度地域化——时空压缩的成就恰恰成为时空联合的障碍。第三，平台资本主义与零工经济使劳动过程日益原子化，“朝

不保夕者”正在许多地区成为劳动主体的重要形态，集体行动的组织基础被持续侵蚀。其二，“自由王国”应当被理解为调节性理念而非构成性蓝图，这与前文区分逻辑规定与历史实现的方法一脉相承。未来的“自由王国”不承诺历史的预定终点，其功能在于为批判和行动提供规范尺度；正如恩格斯致布洛赫的信所指出的，历史结果是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所形成的合力([20]: p. 592)，历史规律表现为合力中的趋势而非凌驾于行动之上的宿命。

就此而言，“世界”与“世界历史”的统一不是一劳永逸的终点状态，而是在每一代人的实践中不断被重新提出的开放性任务。对“世界”和“世界历史”这一视角的把握或许还能为考察当代世界的两层面危机提供理论资源：一方面，数字技术对时空的进一步压缩正把“世界”织得更密；另一方面，逆全球化、生态危机与劳动形态的碎片化又在撕裂这一总体。面对这种“更紧密而又更撕裂”的悖论，马克思给予我们关于世界和世界历史的启示在于：问题从来不是要不要一个普遍交往的世界，而是这个世界由谁、以何种目的、在何种时间节奏中被重新组织。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2] 亨利·列斐伏尔. 空间的生产[M]. 刘怀玉, 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1.
- [3] 戴维·哈维. 后现代的状况: 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M]. 阎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 [4] 沃勒斯坦. 现代世界体系[M]. 郭方, 刘新成, 张文刚,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 [5] 萨米尔·阿明. 不平等的发展: 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M]. 高钰,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 [6] 刘德斌. 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结构的演进——以世界体系的发展变化为主线[J]. 史学集刊, 2026(4): 24-45.
- [7] 吴宏政, 曲洪霄.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未来时间视野”及其当代拓展[J]. 贵州社会科学, 2026(5): 14-21.
- [8] 莫斌. “世界哲学”的多重图景[J]. 社会科学研究, 2026(3): 1-8.
- [9] 方维规. 时空经验的认知变革及其分化——近代西方的“世界”概念[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2025, 62(6): 43-62+161-162.
- [10] 赵士发.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问题[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7-08-31(003).
- [11]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8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2]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7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4]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5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5]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马克思的生态学[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 [16]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9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7] 布雷弗曼. 劳动与垄断资本[M]. 方生, 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 [18]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9] 列宁. 列宁选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20]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0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